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中 央 档 案 馆
广 东 省 档 案 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编 辑：岑国森、邵 敏、龙田南

审 稿：陈万安、林忠佳

校 对：梁笑梅、林 早

罗修湖、林忠佳

编出时间：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印刷时间：一九八五年二月

印刷单位：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

印 数：二千份

编 辑 说 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广东团组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 〕”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看不清的人名、地名以“△”代之；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省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团广东省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的同志指正。

目 录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关于广东 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二十六日)	(1)
本党指挥下军队之组织系统 (一九二七年九月)	(25)
中共广东省委复广州市委信 ——关于张、陈倒李，派纠察同志赴海 陆丰等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27)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反抗军阀战争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31)
余增生给周恩来的信 ——汕头失败后出走的经过及对徐光英 处分的陈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7)
参加暴动的人数统计及成份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47)

胡毓秀等三人在潮州失败后被捕及脱险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	(49)
沈宝同关于广东党组织情况的谈话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53)
立三致中央政治局信	
——对中央“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	
决议案的意见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63)
罗登贤黄平关于广州暴动前后情况的谈话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65)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	
——讨论广州暴动问题	
(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	(73)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信	
——关于党务工作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	(117)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汕头等处机关被破获情形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四日)	(119)

梁希陶关于广东目前暴动情形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二月) (121)

宝英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省委机关被破获情形及组织

临时常委事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125)

中共广东省委致家声信

——关于注意接待南洋出席全国党代表

大会代表问题

(一九二八年三月七日) (127)

《青年工人歌》等六首革命歌曲

(一九二八年三月) (129)

海陆丰等地敌我双方军事情况报告(摘要)

(一九二八年四月) (133)

沈宝同等关于广东党组织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 (137)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第七号)

——白色恐怖情形、省委常委的变动、宣传工作、

经费津贴问题

(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 (151)

中共广东省委最近的重要决议案

——接受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指导、

对全省工作的决定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通过) (169)

中共广东省委恒星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王公唯挟款潜逃问题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 (189)

文先致祖述信(先四十五号)

——对两广党务工作的意见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 (191)

干部分子调查表

——干部的成份、历史、职务、工作能力、

家庭状况和对党的认识程度

附：干部分子调查表副页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195)

广东的农妇女工状况

(一九二八年) (229)

中共广东省委经费开支报告表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231)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陈延年关于广东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二十六日）

国民政府的态度有一些变化，具体的事事实是，蒋介石的第一军解散了国民党市委。人民群众把这件事看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命令，仅有蒋介石的代理人张静江的一份电报。国民党市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因为张静江企图把党委控制在他的手里，他想排除右派分子。

消息报道就从这一事件的阶段开始，问题非常严重。在此事件之后，广州的政权落到了李济深的手中，张静江的部分军队驻守在广州和广东省，李越来越向右转，以便保持他在广州的利益，赢得张静江的信任。张静江的军队在城市内，与工人运动相对抗，李的军队在乡村，反对农民运动。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他必须镇压城市的工人运动，向张静江证明，他是镇压工人运动的，因而张也能镇压

乡村的农民运动。

李济深和张静江是广东省的两大势力，尽管它们之间有冲突，但在镇压工人、农民运动上是一致的。

国民党左派有三种倾向：

第一种在群众中有组织和宣传，其领导人是甘乃光，他的追随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

第二种没有群众基础，利用左翼的名义加强它的影响，其领导人是省政府工农部 部长Chu Te-shen。

第三种是有群众的支持，但无组织和领导人，这是一种极左的倾向，甚至比共产党人还要左，其追随者是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

在迁移之前，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第一种倾向。

左翼的第一种倾向有理论，有组织，但由于他们害怕城市中工人运动的发展，他们愈来愈向右，在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移之前，他们对工人运动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没有表示出来。自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移之后，他们开始与军阀势力相妥协。

对于我们来说，支持一个克伦斯基(kerensky)式的政府是不恰当的。

政府的倾向是反工人运动的。他们说，不能置一个阶级的利益于国民利益之上，如果一个阶级的利益与国民利益相冲突，我们必须牺牲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说，工人们不要举行罢工，因为罢工违背国民的利益。新的警察局长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们的党支持工人的利益，但希望工人们尊重国民的和政府的利益。

他们说，共产主义不能表明时代的特征。我们可以和共产党在一起，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独立的组织和理论。我们的职责是与工人阶级在一起，但必须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右翼利用了北京会议的理论。

1. 左翼的政策，是团结从右翼到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一切力量反对共产党。

2. 他们企图分裂群众的力量，例如他们除组织现有的工会之外，还组织起其他的新的工会。

3. 报刊不发表关于共产党的消息，相反，发表一些对共产党不友好的消息，他们在其他报刊上使用武力发表这些消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

发表有关工人、农民情况的消息，这样的消息只能在香港的报刊上，而不能在国民党的报刊上发表。

这种封锁政策造成的结果是，我们报刊的发行量增加了三分之一。

结论：

国民党左翼在广州市委的压力下，由于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相妥协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其结果是造成了左翼与我党之间的特殊的关糸。

在一月份国民党省委的选举期间，大会的代表力量有我们的组织、左派、右派、农民、地主等，共有二百零八代表，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左派在选举中表现动摇，他们比较弱，与我们的联系不多。我们尽一切力量支持他们，但他们出卖了我们。左派在二月份的市委选举中失败了。

群众的力量：

1. 农民和工人。其他群众在运动中没有起很大的作用。政府在这一次没有支持农民和工人运动，群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工、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农民的力量强于政府的力量，因此，政府特别是李济深害怕农民。

工人们特别是商店职员要求增加工资，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举行了几次罢工。

广州的工业发展不很大，广州的形势极为严重。

2. 农民运动。

组织不稳定，国民党想分裂农民运动，企图成立新的农会，放弃现存的农会。

广东省的农会有六十二万会员。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在政府迁移之前，三月二十日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省委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出现了恢复左翼政权的倾向，如果不是说恢复的话，至少是牵制了右派的行动。

大会的第一重要之点是提出了一个最低纲领。除了国民党一、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之外，我们需要一个最低纲领来团结国民党内的一切劳动者。三月二十日之后，左派不知所措，纲领应该向他们指出斗争的目标。那时我们认为，任何承认这个最低纲领的人，都可以作为左派。

大会的第二重要之点是各阶层人民的统一，一个左派的群众组织，在这个协会中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力量。将举行省、区、乡的人民代表会议。

大会的第三个重要点是组织问题。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常委，常委设有一名主席，主席是张静江，此外，还设立了一个政治委员会。计划准备改变这种制度，废除常委，只设立政治委员会这一个组织。计划改组的第一个理由是，如果右派知道政治委员会不起任何作用，那末他们知道常委会通过的。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汪精卫，在他三月二十日离开后，谭延闿是代理主席。如果常委取消，那末主席就是谭延闿，这也就是政治委员会的主席。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委员会向代表大会负责。在大会停止期间，政治委员会将是最高的机构，国民政府委员会将代替常委，成为最高机构。

同时，广东区和黄埔学校的所有国民党组织要求汪精卫回来。

联席会议上的气氛非常左。

中央委员会认为联席会议非常重要，指示我们，代表大会必须恢复党的权力和左派在党内的领导。中央告诉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交回汪精卫。那时，蒋介石不可能对这样的会议进行镇压，因为那时的气氛很强烈。蒋的策略很有意思，他发了一个要汪精卫回来的电报，通过李济深把这个消息传

给了汪精卫，要求汪回来。但任何人立刻就会明白，蒋不想要汪精卫回来，李是北京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不可能要求汪回来的。那时纲领已经提出，但没有人反对。孙科特别左，当最后提出组织问题时，张静江反对，孙科表示出同样的反对意见。在张静江反对之前，左派同意我们同志们的意見，但张静江表示反对时，他们就害怕了。廖仲恺夫人和陈树人等领导人去鲍罗庭那里，要求鲍劝诱左派不要走的太远，甘乃光表示同样的意見。△△①同志特别善于解释所要听取的教训，左派不能再坚持下去。他告诉他们，我们左派不应受共产党的欺骗，共产党反对左派，想把我们左派置于右派与共产党之间，让他们互相斗争，互相残杀，我们必须跳出来，共产党想把我们当作缓冲器。这是他的经验教训。谭延闿告诉我们不再坚持下去，汪不可能回来，他应该成为主席。因此，我们很容易地看出，左派不会再坚持下去。共产党说，我们不应受任何人的欺骗，中央委员会指示我们不要孤军作战，因为右派和共产党之间很容易发生战斗，我们必须改

①原文如此，下同。

变我们的策略。尽管已通过革命的纲领，但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即恢复党的威信的工作还没有做。

那时，李济深非常友好，一旦张静江被捕，他会发出一个要求汪回来的通电。他与左派站在一起，在会议上非常活跃，但蒋介石表态时，李没有说什么，现在他变得消极起来，除了别的原因外，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权力没有蒋介石的权力〔大〕。蒋介石也说，他希望汪精卫回来，在会议的向左的气氛之下，每个人都希望汪回来……①。
△△说，我的兵力不多，要说几句话不方便。这是每一个军人的心理。在这种气氛之下，几乎每个人都得表态。广州被蒋介石所控制，东江地区也在蒋的手里。

李倾向于左派，他甚至同意牺牲他最好的政治朋友古应芬，因为古转向右派，但李不可能反对蒋介石。李牺牲他的政治友人古应芬，表明他的左倾，是为了取得革命的帮助，发展他自己的力量。在牺牲古应芬之后，他发现得不到革命群众的帮助，他不可能反对蒋介石。李济深既不是左派，也

①原文如此，下同。